

三聯人文書系

陳平原 主編

錢理群 著

與周氏兄弟相遇



陳平原 主編

三聯入文書系

錢理群 著

與周氏兄弟相遇



三聯人文書系

主 編 陳平原

責任編輯 俞 笛

書籍設計 彭若東

書 名

著 者

出 版

香港發行

印 刷

版 次

規 格

國際書號

與周氏兄弟相遇

錢理群

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一〇六五號一二三〇四室
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Rm. 1304, 1065 King's Road, Quarry Bay, Hong Kong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

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

二〇〇八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大三十二開 (141×210 mm) 二四〇面

ISBN 978 . 962 . 04 . 2797 . 8

© 2008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總序

陳平原

老北大有門課程，專教「學術文」。在設計者心目中，同屬文章，可以是天馬行空的「文藝文」，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「學術文」，各有其規矩，也各有其韻味。所有的「滿腹經綸」，一旦落在紙上，就可能或已經是「另一種文章」了。記得章學誠說過：「夫史所載者，事也；事必藉文而傳，故良史莫不工文。」我略加發揮：不僅「良史」，所有治人文學的，大概都應該工於文。

我想像中的人文學，必須是學問中有「人」——喜怒哀樂，感慨情懷，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，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；另外，學問中還要有「文」——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「學問」與「文章」之間的巨大鴻溝。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，最後成為一代學者；而歷史學家錢穆，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。有此「童子功」的學者，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，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。當然，學問千差萬別，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，今人著述，盡可別立新宗，不見

得非追韓摹柳不可。

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：「鄙意論學文字極宜着意修飾。」我相信，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。不僅思慮「說什麼」，還在斟酌「怎麼說」，故其著書立說，「學問」之外，還有「文章」。當然，這裡所說的「文章」，並非滿紙「落霞秋水」，而是追求佈局合理、筆墨簡潔，論證嚴密；行有餘力，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「高難度動作表演」。

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「專著」不同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；就連自家買書，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，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。前年撰一《懷念「小書」》的短文，提及「現在的學術書，之所以越寫越厚，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，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，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」。外行人以為，書寫得那麼厚，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。其實，有時並非功夫深，而是不夠自信，不敢單刀赴會，什麼都來一點，以示全面；如此不分青紅皂白，眉毛鬍子一把抓，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。只是風氣已然形成，身為專家學者，沒有四五十萬字，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。

類似的抱怨，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，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。那天港島聚會，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，沒想到她當場拍板，要求我「坐而言，起而行」，替他們主編一套「小而可貴」的叢書。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？原來香港三聯向有

出版大師、名家「小作」的傳統，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畫一套此類叢書，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。

記得周作人的《中國新文學的源流》一九三二年出版，也就五萬字左右，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，但還是承認：「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，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，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，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思。」稱周書「有系統」，實在有點勉強；但要說引起「許多反思」，那倒是真的——時至今日，此書還在被人閱讀、批評、引證。像這樣「小而可貴」、「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思」的書，現在越來越少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嘗試一下？

早年醉心散文，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，晚年有一妙語：「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，今年快百歲了，寫了一輩子，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，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，可能就三篇吧。」如此自嘲，是在提醒那些在「量化指標」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，悠着點，慢工方能出細活。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：或許，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，三五篇代表性論文，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；而對於讀者來說，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，進入某一專業課題，看高手如何「翻雲覆雨」，也是一種樂趣。

與其興師動眾，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，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，得到一張左右支

拙的「英雄譜」，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，這既非學術史，也不是排行榜，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，以他的眼光、趣味與人脈，勾勒出來的「當代中國人文學」的某一側影。若天遂人願，舊雨新知不斷加盟，衣食父母繼續捧場，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，我相信，這一「圖景」會日漸完善的。

最後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：第一，作者不限東西南北，只求以漢語寫作；第二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，目前僅限於人文學；第三，不敢有年齡歧視，但以中年為主——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，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。這三點，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

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

目錄

小序·····	001
「多疑」、「尖刻」中的現代智慧——魯迅思維方法論·····	007
周作人的民俗學研究與國民性的考察·····	051
魯迅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·····	097
魯迅和北京、上海的故事·····	139
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化·····	201
作者簡介·····	226
著述年表·····	227

小序

回顧我的人生軌跡與治學之路，最有意義的，大概就是和周氏兄弟——魯迅與周作人的相遇。

早在中學時代就讀魯迅作品，在大學期間，又把新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通讀了一遍，但許多地方都讀不懂。真正讀進去，並且有了自己的體會，是在文革後期。中國與自己都走到了絕境，在極度的苦悶中，和一群年輕朋友探討「中國向何處去，自己向何處去」時，與魯迅相遇了。我的第一本魯迅研究專著《心靈的探尋》就是這次相遇的產物，本書第一篇《「多疑」、「尖刻」中的現代智慧》就是其中的一篇。第二次相遇，是在二〇〇〇年我遭遇了一次全國性的大批判，大病一場以後，又有了一次絕望的生命體驗，並且有了《與魯迅相遇》，這裡選了《魯迅和現代評論派的論戰》這一章。記得在這書的《開場白》裡還講過這樣一番話：「人在春風得意、自我感覺良好時，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；人倒楣了，陷入了生命的困境，充滿了疑惑，甚至感到了絕望，這時就走近魯迅

了。」——這當然只是個人經驗之談。而且我的經驗也不全是如此：在我退休以後，又出現了一次研究、言說魯迅的高潮，也可以說是第三次相遇。但這一次我的心境就很難用「絕望」來簡單概括。由於解脫了體制內的大學教授的身份，倒反有一種「胡思亂想，胡說八道」的自由感，思想的視野，精神的境界，都比原先開闊了許多，也更能以從容的心態和魯迅對話——當然，內在的憂患也比原先深廣了許多。本書的最後兩篇就選自退休後出版的《錢理群講學錄》、《魯迅九講》二書。

結識周作人，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；在此之前，我僅知道他是魯迅的弟弟，散文寫得而已。正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「回到五四」那樣一個啟蒙主義的時代氛圍中，我與啟蒙主義者周作人相遇了。我從他那裡，看到了和魯迅相通，又是那樣不同的啟蒙思想、知識結構、言說方式，我有一種發現的喜悅。同時又喚起了我深藏在內心，卻又長期被壓抑的那些更為溫柔、平和、精緻的情感與趣味，這樣的自我發現，曾一度讓我著迷。我可以說是用與寫作魯迅完全不同的心境，去寫我的《周作人傳》與《周作人論》。我在一篇回憶文章裡說，那是一段「充滿了溫馨」，「令人懷想的歲月」，「頗有一種自由感與鬆弛感」，於是就有了幾分「灑脫」，幾分「從容」（《歲月無情又多情》），這都是可以從那時寫的文字（哪怕是學術論文）裡感覺得到的。

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，我似乎是和周作人告別了。在一篇文章裡，我曾經解釋說，那是因為周作人突然「熱」了起來，其實是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構造，我不想去「湊熱鬧」。另一個更為內在的原因，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和世界社會的大混亂、大變動中，我的思想、情感與心境都更趨向魯迅，我也更願意言說魯迅：我以為這是自己的責任所在。但我仍在內心深處為周作人保留了一個角落，「稍有空閒，即讀其書而與之談，每有所悟，必欣欣然而隨手記下」，於是，又在二〇〇一年出版了《讀周作人》一書，不過，這已是「業餘寫作」，帶有「自我調節、自我發現的自娛性質」（《〈讀周作人〉小引·後記》）。出版後好像也無人注意，我自己卻不時翻出來看看。本想也選一篇收入本書，但都是文本細讀，於體例不合，只好割愛。

其實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，我還開過一門「魯迅、周作人思想研究」課，整理出《話說周氏兄弟》一書，在青年學生中產生過不小影響。其中一篇談《有意味的參照》，本也想選入，但由於論題未充分展開，分量不足，也就捨棄了。不過其觀點倒無妨這裡說一說。主要是講了三層意思：一是強調周氏兄弟思想上的一致性，他們最關心的是「立人」，是「個體的精神自由」。但他們又有各自不同的關注點，不同的領域，有極大的思想互補性。其二，面對中國社會的全面危機，他們在價值取向、人格自塑、人生和文學道

路上都作出了不同的選擇，代表了現代知識份子的兩種範式。其三，和屠格涅夫分析的堂吉訶德、哈姆雷特一樣，周氏兄弟這兩個典型，也「體現着人類天性中的兩個根本對立的特性，就是人類賴以旋轉的兩極」，構成了一個文化、精神、人格的共生體，需要作一個綜合的把握。

因此，在我看來，周氏兄弟的研究，還有很大的潛力與前景。我只是佔了一個「開始得早」的便宜，所寫的這一切，不過是「橋樑中的一木一石」。用今天的學術眼光來看，實在是簡陋粗疏得很。因編此書，重讀舊文，雖不免有些眷戀，因為這畢竟是自己生命的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卻更感羞愧，以至沮喪。寫到這裡，突然想起王瑤先生在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重版後記裡，引述了魯迅的話：「誠望傑構於來哲也」。就學術發展而言，這是確實如此的。

以上所說，都是「學術」與「人」的關係；按主編《總序》裡的要求，似乎還應該及「學術」中的「文」，即「學術文體」的追求。我曾經多次說過，自己一身兼任學者與教師，而且把教師看得更重；這樣的特殊身份認同，也決定了我的寫作方式，大部分文章都是先有提綱，在課堂上講過以後，再正式整理成文，這自然也就影響了行文的風格，形成了一種「對話體，或演講體」的「學術文體」。在退休以後，雖然離開了正式課堂，但仍

在到處「講學」，而且因為不是正規上課，也就更為隨意而自由，揮灑一種我稱之為「隨筆式的學術文體」。後來因為研究的需要，重讀當年的「胡風份子」張中曉的《無夢樓隨筆》，讀到他的一句話，不禁怦然心動：「一部學術著作的真正價值，在於它把尋常的敘述因素和尊嚴的思辨形成藝術的結合，不僅給人多聞博識，同時給人以深刻和純真的樂趣」，這正是我所追求的學術風格和學術境界，雖不能至，卻心嚮往之。

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，六月十一日補寫一段

「多疑」、「尖刻」中的現代智慧

——魯迅思維方法論

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……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。

——《野草·淡淡的血痕中》

一

對於魯迅，有一種含有貶意的觀察：說他多疑而尖刻。面對着懷有惡意的攻擊與並非懷有惡意的批評，我們的一些同志採取了迴避態度，或者引用另外一些材料來證明這都是一些誤解；據說這是為了維護魯迅。

其實魯迅無須維護。為尊者諱，本身就是魯迅最痛恨的華夏傳統之一。魯迅的偉大正在於，他的一切都可以公之於眾，讓人們在光天化日之下予以評論，以至批判——他幾乎是唯一可以不加刪削、修改地出版全集，而絕不會損害他的形象的現代中國思想家、文學家。

科學研究無禁區。我們應該從事實出發——不是按照預定的觀點，經過主觀篩選的事實，而是與論題有關的全部事實。

是的，我們可以舉出大量的事實證明魯迅並不多疑、尖刻，相反卻是過於天真、過於

寬厚了。請讀許廣平的《魯迅回憶錄》，特別是《魯迅和青年》那一篇。那著名的「兒子」的故事，是叫人哭笑不得的。許廣平由此而發出的感慨，可謂深知魯迅之言：「誰說先生老於『世故』，我只覺得他是『其愚不可及』。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呆子嗎？可是這呆氣，先生卻十分珍貴着。他總是說：『我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了賊，就疑心一切的人。』」〔二〕

魯迅不贊成「赤膊上陣」。他在與人相處時，也總有所保留，並不赤裸相見。〔三〕只有在少數比較親近、信任的人面前，魯迅才比較多地顯露出自己的真相。讀魯迅給曹靖華、章川島、胡風、蕭軍、蕭紅等的書信，會強烈地感到魯迅對人誠摯、直率、寬厚、無微不至的關懷，甚至天真。應該說，這都比較接近魯迅的真性情。魯迅摘譯島崎藤村《從淺草中來》中有一句話：「我希望常存單純之心；並且要深味這複雜的人間世」，「當混

【一】許廣平：《魯迅和青年們》，《欣慰的紀念》，收《魯迅回憶錄》（上），三五五頁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出版。

【二】殷夫一次與魯迅相見時，他的感覺是：「魯迅話很少，又冷，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」，以致於很「悔」與魯迅相見，這表現了殷夫作為詩人的敏感與真摯。魯迅連忙去信解釋：「初次相會，說話不多，也是人之常情」。（《為了忘卻的紀念》，《魯迅全集》四卷，四八〇頁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版，下同，不一一注明。）